· 清史研究 ·

从朝野反响看翁同龢开缺前的政治倾向

马忠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北京 100006)

摘要: 由于戊戌政变后康、梁在海外极力宣扬翁同龢积极“支持”变法,清廷也以翁曾“力陈变法,密荐康有为”为由将其革职,翁氏支持改革的新派形象由此得以树立,并对后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然而,仔细爬梳翁同龢开缺前后朝野的即时反响,可以发现,各界对其罢官原因的推测虽有不同,但几乎所有人都视翁同龢为守旧者。这种新一旧的极端反差,并未得到学界应有的重视。事实上,翁氏在政变后被打入“康党”是各种力量政治斗争的产物;翁氏并非因支持康、梁变法而成为“康党”,而是在被打成“康党”后变成“新派”人物的。翁同龢身上的“新”色彩是被强加上去的,带有鲜明的政争意味。

关键词: 翁同龢; 光绪帝; 开缺; 革职; 变法; 守旧

长期以来学界围绕翁同龢开缺原因的讨论,多与其对戊戌维新的政治态度相关联。^①对此,谢俊美教授有过详细的评述,兹不赘述。^②不过,争论过后,将翁氏开缺归结到支持变法与举荐康有为似乎仍是主流观点,至少,大部分通史类著作和教材仍沿袭了这种传统说法。

然而,当我们今天毫不怀疑地把翁同龢视为支持变法的“新派”人物时,其实忽视了一个现象:在当时很多人的心目中,翁氏恰恰是一位“守旧”者。“新”与“旧”的判断标准可能随着时代的进步有相对的差异性,时人视为新潮、今人视为落伍者的现象比比皆是;相反,今人视其为“新”而时人却视其为“旧”,倒是近代史上十分罕见的先例。如果对戊戌政变前时人的日记、书信以及官方档案等原始文献仔细爬梳,我们会发现,许多人心目中的翁同龢确实很“旧”,绝非政变后康、梁所说的那么“新”。

一、在华外人对翁氏开缺的反应

说到戊戌年春翁同龢的政治底色,总是与这年四月二十七日(6月15日)翁氏开缺事件相关联的。翁氏开缺后,传言甚多,各方对翁的评价也不尽一致,彼此细节也互有参差。然而,这

① 关于该问题的讨论由来已久,其中近40年来的相关论著有吴相湘的《翁同龢戊戌罢官原因》(《晚清宫廷与人物》第1集,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0年,第81-90页)、谢俊美的《关于翁同龢开缺革职的三件史料》(《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3期)、戴逸的《戊戌变法时翁同龢罢官原由辨析》、俞炳坤的《翁同龢罢官缘由考析》、侯宜杰的《略论翁同龢开缺原因》(上述三篇文章均收入常熟市人民政府、中国史学会编《甲午战争与翁同龢》,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以及舒文的《翁同龢开缺原因新探》(《清华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杨天石的《翁同龢罢官问题考察》(《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3期)等等。

② 谢俊美《20世纪翁同龢研究述评》,《江海学刊》2003年第6期。

些头绪纷繁的传言,却为我们了解这一事件的原委提供了初始的历史场景。

戊戌年四月二十七日,在恭亲王奕訢病逝不久,朝廷颁布“定国是诏”的数日后,一位有着帝师崇高地位的军机大臣突然遭到罢黜,这在当时朝野产生的震动是不言而喻的。由光绪帝亲笔书写的朱谕公布了翁氏的“失职”状况:“近来办事多未允协,以致众论不服,屡经有人参奏”,“且每于召见时,咨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见于词色,渐露揽权狂悖情状,断难胜枢机之任。”以皇帝的口吻如此措辞,很难说理由不充分。谕旨又称“本应查明究办,予以重惩,姑念其在毓庆宫行走有年,不忍遽加严谴”,所以仅令其开缺回籍,“以示保全”。^①这样的表述,似乎在法理之外也兼顾了不同寻常的君臣情谊,显得合情合理。但是,当时人们普遍认为此事幕后尚有不便形诸笔墨的深层原因,纷纷猜测不已。

清廷政局动向与西方列强在华利益及其对华政策密切相关,因此,一些在华外交官以及海关人员都对翁氏开缺表现出特别的关注。四月二十八日(6月16日),美国驻天津领事向华盛顿方面报告翁同龢开缺情形时说:“多年来,他一直身居要职,且深得皇帝宠信。据认为,他相当诚实,心地善良,但极端排外,是顽固派中的顽固派。……据预测,翁的罢退意味着一个更为孱弱的统治时代的开始。”^②英国公使窦纳乐也注意到,亲笔谕旨突然出现,使得中国政府高级官员们相当激动。四月三十日(6月18日),他在给英国首相兼外相沙侯(沙士勃雷)的信中说道:“我最初相信翁的命运与6月11日及12日上谕里预示的自由改革,不是不相连的……但北京流行的意见,是现在恭亲王死了,慈禧又在伸张着她自己的权力。”窦氏所说“北京流行的意见”无疑是指流行于京城士大夫中的看法,可见,当窦纳乐想从政见分歧的角度分析翁氏开缺的原因时,却发现中国人思考问题的角度与他并不相同,北京的士大夫似乎更强调高层权力斗争的因素。具体到翁同龢本人,窦纳乐认为,尽管翁头脑中那种“不变地来反抗革新及进步”的思想倾向比以前已有所改善,但总体上说,翁氏仍是“受人尊敬的,有学者风度的——一位守旧的中国政治家最优美的典型”。^③“守旧的”又是“最优美的”,这种表述看似矛盾,恰好反映了西方人评判问题的平和心态。

同日,总税务司赫德致函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理循,谈了他对清廷政局变化的看法。他说:“这个星期里发生的事件(指四月二十三日颁布“明定国是”诏——引者)是重要的和意味深长的。它意味着一种过于守旧的政策之放弃。”显然,赫德对光绪帝实行新政十分赞赏,与其一贯建议中国实行改革的立场并无二致。对于翁开缺,赫德称:“据说他利用了作为太傅的职权,过多地干预了这位皇帝关于实行民众参政的主张,可惜的是,这位皇帝没有把它实行的温和一些!”^④同窦纳乐相比,赫德对北京官场的情况更熟悉一些,与翁同龢本人也有一定的私交,此时他也将翁视为妨害皇帝从事改革的守旧者,恐怕不全是偏听偏信。同一天,赫德又写信告诉远在伦敦的金登干说:“事情的真相仍不明朗……翁氏的忙乱、守旧或许助长了一场宫廷政变,使大权落到慈禧太后手中,于是皇帝对他颁下无情的谕旨。”这里也涉及帝后关系及高层斗争,并认定翁是守旧的,罢黜翁氏完全出于皇帝的决定。当然,赫德本人的上述论断,也是以各种传言为基础做出的推断,到底出于什么原因,他也不能确定,所以用了

① 《清德宗实录》卷418,光绪二十四年四月戊申,《清实录》第57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484页。

② 《美国新任驻天津领事向美国国务院报告》,1898年6月16日,转引自清华大学历史系编《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第699页。

③ 《窦纳乐致沙侯信》,《戊戌变法》丛刊第3册,第544-545页。

④ 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莫理循书信集》上册,上海:知识出版社,1987年,第105-106页。

“据说”、“或许”这样的字眼。^①五月初二日(6月20日),天津海关的洋员艾·爱·贺璧理致信莫理循说:“(6月)15日的诏书(即翁氏开缺朱谕——引者)构成了一次政变。它的重要性在于即使不是真正废黜,也是实际上废黜了皇帝,这样说不算夸大……慈禧太后胁迫这位可怜的年轻皇帝革去了他最忠诚的支持者翁同龢的官职。”^②贺璧理得到的消息没有提到翁氏的政治倾向,只是强调太后逼迫皇帝赶走了他的师傅,这与赫德所闻截然相反。

可以看到,在事件发生后的几天里,龚纳乐、赫德、贺璧理等活跃在京津的外国人对事态极为关注,虽然他们得到的消息不尽确切,对事件的判断也不很清晰,并多少有按照西方人的标准来观察问题的特点,但大体上还是反映出当时北京官场中流行的几种基本说法:其一,翁氏开缺与慈禧扩张权力有关,是皇帝的权力受到限制的一种反映;其二,相对于对光绪帝实行的改革而言,翁是守旧的;其三,翁氏开缺是光绪帝自己的决定,不过也有人认为是慈禧胁迫皇帝做的。有些说法彼此或有抵牾,正说明了官场传闻的不确定性。

二、京内外官员和士人的评说

身在北京的各级官员和士人比外国人更关注此事的缘由。现在留下的文献虽有限,仍然可以窥见时人的心态和见解。

翁氏开缺发生得似乎很突然,就连翁的同僚、户部左侍郎、总署大臣张荫桓也颇感意外。这一天张氏也在颐和园,直至午初,军机章京凌福彭(字润台)、军机大臣廖寿恒(字仲山)来访后,方知翁氏开缺之消息。这让他惊骇不已,急忙“往晤常熟(翁同龢),并询庆邸(奕劻)”,^③意在打听内幕。张氏探听到的消息,在稍后他与日本公使的谈话中,略见梗概。张氏告诉日本人:“翁氏免官,其原因之来甚远,先年日清事件主张开战者,即是此人。该事件以来,清国多灾多难,尔后翁所主张之诸多政策不合时宜。又由于翁氏在清廷内部往往被视为专权骄恣。此种状态渐为积累,遂导致此次结果。”张又言及翁反对皇帝与德亲王行握手礼,对陪侍外国使节态度消极并对皇帝“大放怨言”。^④显然,张氏是从追究翁同龢失职的角度解释翁氏开缺原因的,在反对皇帝与德国亲王握手等涉外活动方面,张也认为翁太过守旧。

叶昌炽在四月二十八日(6月16日)日记中写道“阅邸钞,虞山师奉旨放归。朝局岌岌不可终日,如蝸如蟪,如沸如羹,今其时矣。柬蔚若,得复云‘近日号令,但恨两耳不聾,鄙人亦求璜甚切。’”^⑤虞山,指翁同龢;蔚若乃吴郁生之字,叶、吴均是江苏人,且为翁氏门生。从两

①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合编《中国海关秘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1874-1907)》第6卷,中华书局,1995年,第863页。此外,赫德给金登干的电文中也提及翁氏开缺之事。6月16日,赫德致电金登干说:“刚刚颁布的一些重要的谕旨,表明慈禧太后正在夺得大权。一道谕旨是将皇帝的师傅,以为大学士撤职;另一道谕旨是命令高级官员对其擢升官职等等感谢慈禧太后。奇怪的事情和新奇的做法完全可能发生。俄国人的地位正在不断提高。”6月18日又致电金登干说,“中国人现在说,目前采取主动的是皇帝,不是慈禧太后。如果是这样局势就会好些。”(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合编《中国海关秘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第9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11-212页)

② 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理循书信集》上册,第106页。

③ 任青、马忠文整理《张荫桓日记》,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第537页。

④ 孔祥吉、村田雄二郎《翁同龢为什么被罢官——张荫桓与日本公使矢野文雄密谈理读》,《光明日报》2003年10月14日,第3版。张荫桓对翁氏不谙外事早就有所批评,如1896年12月3日,张氏在会晤李提摩太时告诉他,“北京中国政府的衰弱,归因于恭亲王的体弱多病和翁同龢对外国事务的蒙昧无知。警察院的御史们权力很大,翁同龢也怕他们。”(见李提摩太《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39页)

⑤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钞》,《戊戌变法》丛刊第1册,第528页。

人信函往来中透露的信息分析,叶昌炽与吴郁生对四月二十三日开始颁布的新政“号令”并不赞同,认为翁的放归与此相关。至少,他们是将翁置于新政的对立面,这与窦纳乐、赫德将翁氏视为“守旧”可谓一致。

与政变后康、梁连篇累牍大谈翁氏因“荐康”被开缺的情形不同,翁开缺当时,康、梁对其中的内情也显得未知就里。五月初七日(6月25日)梁启超致函夏曾佑称,“覃溪以阻天津之幸,至见摈逐”。^①“覃溪”为清代学者翁方纲的号,这里指代翁同龢;所谓“天津之幸”则指慈禧到天津阅兵之事。此时夏曾佑在天津编辑《国闻报》,与梁关系极密,以致被汪大燮斥为“康党”。^②梁启超所说因阻天津阅兵而被罢官,应是康、梁对翁开缺原因的最早解释。不管从何得此消息,这样解释未免肤浅。五月十七日(7月5日)梁致夏的另一封信中又说“常熟去国,最为大关键,此间极知其故,然不能形诸笔墨,俟届时详之。南海(康有为)不能大用,菊生(张元济)无下文,仆之久不察者,率皆由此而生也。”^③仅仅相隔十天,其说法就有了新的变化,梁虽提及“常熟去国”与康、张、梁等新党人物不能得到相应安置有关联,但是,翁氏究竟是因为支持还是反对新政而获罪,仍是语焉不详。梁自称“此间极知其故”,只是“不能形诸笔墨”,但是,他知道的内情是否比其他官员更有权威性,并不能得到证实。有一点可以断定,在康、梁当时的言说中,重心也在官场的人事纠葛上,并未明确提及翁氏支持或反对变法的问题,更没有他们在政变后反复申说的翁氏“荐康”情节。

京外官员对此事也有反映。四月二十九日(6月17日)郑孝胥在南京闻知翁氏开缺的消息后,联系数日前颁布“明定国是”诏的背景分析道“翁既逐出,拟旨者乃刚毅、钱应溥、廖寿恒等也。度其情形,翁必主上以变法自强,满洲人及守旧之党,遂构于太后而去之。翁去则上孤,而太后之焰复炽,满朝皆佞楚,而亡在旦夕矣。”^④郑氏是新派人物,又是翁极力赞许的后进,^⑤这可能是他揣测翁因主上变法而遭黜的原因。同在张之洞幕中的陈庆年则是另一种说法。四月三十日(6月18日)陈氏日记记云:

朱强甫见过,知康有为等为侍讲学士徐致靖所保,著于二十八日召见。下晚,王雪臣招饮,知二十五日谕旨;或谓学士之子仁铸主张康学。康党如梁启超、谭嗣同并尊康,黄遵宪亦附之,故均见保。翁同龢喜康,徐以是深结于翁。二十七日忽有朱渝罪状,翁著开缺回籍……以是知二十三日有上谕变法,殆亦有翁主康说而然也。康之命意在解散君权,以便其改制之邪说。如朝廷知是保之由来,恐不免于罢斥。数日之内,能鼓动翁老至此,其势力甚大,令人生畏。彼固不料甫逾一日,失其所倚也。^⑥

朱强甫、王秉恩(字雪臣)与陈庆年都是张之洞的幕僚。张与翁素不相能,又极力反康,“翁同龢喜康”、“主康说”的言论出现在张氏幕府中自然不意外。其实,朱、王等人也不了解真相,说翁氏喜康也是猜测,他们对翁氏开缺流露出幸灾乐祸的情绪。五月初九日(6月27日)张氏

① 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21页。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说“翁同龢知之,不敢明言,唯叩头谏止天津之行,而荣禄等即借势以去之。”这种解释已在政变之后(见《戊戌变法》丛刊第1册,第261页)。

②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787页。

③ 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第122页。按,南海指康有为,菊生为张元济的字。

④ 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662页。

⑤ 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5册,第2852页。郑孝胥于光绪二十一年冬抵京参加引见,曾几次拜谒翁同龢,回到南京后即引起张之洞的冷落和疏远(参见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1册,第540-541页)。

⑥ 陈庆年《戊戌己亥见闻录》,《近代史资料》总81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113页。

的另一位僚属恽祖祁在常州发电给张之洞“常熟端节出京,闻因谏事拂慈圣意。”^①看来他听到的又是另一种说法,对于真实原因均不详知。

当时的报章也从侧面反映出人们对此事的看法。五月初九日《申报》刊载了题为《圣怒有由》的一篇文章,称翁之开缺与恭亲王临终遗嘱有关。文章说:

此次恭忠亲王报疾之时,皇上亲临省视,询以朝中人物谁可大用者?恭忠亲王奏称,除合肥相国积毁销骨外,京中惟荣协揆禄,京外惟张制军之洞,及裕军帅禄,可任艰危。皇上问户部尚书翁同龢如何?奏称是所谓聚九州之铁,不能铸此错者。甲午之役,当轴者力主和议,会建三策……时翁大司农已入军机,均格不得行,惟一味夸张,力主开战,以致十数年之教育,数千万之海军覆于旦夕,不得已割地求和。外洋乘此机会,德距胶澳,俄租旅大,英索威海、九龙,法赏广州湾,此后相率效尤,不知何所底止?此皆大司农阶之厉也。于是,向之不满意于大司农者,至此咸不甘以仗马贻讥,交章劾奏,皇上保全晚节,遂令解组归田。^②

这篇由“天津采访友人”所写恭王遗言的情况,很具细节,犹如亲耳所闻。不论其确否,也不论《申报》刊此文章有无政治背景,有一点大约可以肯定,即当时荣禄治下的直隶官场在赞誉荣禄、张之洞、裕禄“可任艰危”的同时,已经流传着翁氏开缺系因朝廷追究甲午主战误国罪责的说法,只不过是借助于已经去世的恭王之口说出而已。如果联系到上述传言与荣禄的关系,以及张荫桓从庆王处打听内幕的情形,似乎可以断言,荣禄、庆王散布出来的内情也就如此,即翁氏开缺系因办理政务失当所致。

吴汝纶的记述也印证了直隶官场的传闻。五月十六日(7月4日),身在保定的吴汝纶致函周馥评论说“朝局倏忽一变,国师黯黯南归。然此三年中,所失不小。以三尺法论之,似仍是情重法轻,不足相抵。惜人才希少,继之者未必胜之。郑五作相,时事可知,顾念时危,惻然心悸。”^③翁氏当国的三年,正是甲午至戊戌间,此间内忧外患,翁氏身兼枢译,难辞其责,故吴氏对翁的开缺毫无惋惜之情,甚至断言处罚太轻。无独有偶,文廷式后来也有相似的评论:

戊戌四月,恭亲王薨。不逾月而常熟开缺回籍。忠王平日亦不悦常熟,而比其薨逝,人尤危之。盖本朝厚待师臣,忠王未尝不体上意护持之也。然数年以来,失胶州、失旅顺,失长江之利,东三省隐与俄,广西、云南隐与法,江浙属英,闽属倭,皆欺中国臣民而徇外国之请。伊古以来,亡天下之魂,未有甚于今日!又行昭信股、西铺税、药牙税……削百姓,殆无生路。常熟任枢廷、译署,且兼户部,难逃天下后世之责矣。^④

如果说吴汝纶的淮系色彩浓厚,议论不免有立场问题,文廷式则是翁同龢的得意门生,甲午时期最积极主战的人士,他后来对翁之失职亦不讳言,可见当时对翁氏有意见者不在少数。因此,上谕中对翁“近来”种种不胜任枢务的指责不能说全无凭据。

① 恽祖祁来电,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初九日酉刻发,初十日未刻到,《张之洞存各处来电》,戊戌第2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藏,档号甲182/136。

② 见《戊戌变法》丛刊第3册,第381-382页。

③ 施培毅、徐寿凯点校《吴汝纶集》第3册,合肥:黄山书社2002年,第194页。

④ 汪叔子编《文廷式集》下册,第761页。文氏又言“翁叔平尚书与余素善,余疏落,要不常相见。然比者以一人而兼任师傅、军机、总理衙门、督办军务处,又领户部,皆至要之职,而犹谓不能办事,又不欲居权要之名,一彼一此,迄无定见。以此召乱,谁能谅之?嗟乎!张茂先,我所不解也。”(《文廷式集》下册,第726页)

那么,翁同龢本人又是怎样看待此事的呢?他虽然向弟子表示“人臣黜陟,皆属天恩”,^①内心却另有想法。翁氏日记中虽尽力隐讳,仍露出蛛丝马迹。五月十二日(6月30日),翁氏离京前夕,孙家鼐(燮臣)、徐郙(颂阁)两位老友前来话别,很晚才离去。孙、徐似乎向翁氏透露了什么消息,使翁显得感慨万千。他在日记中写道“晚燮臣、颂阁来话别,直至戌正二(刻)乃去,真深谈矣。余何人也,仿佛谢迁之去耶?为之一叹!”^②这段话,暗藏着翁氏对自己受黜原因的判断。上世纪70年代,台湾学者黄彰健最先对翁氏这段隐含深意的话进行了解读:明朝嘉靖年间内阁辅臣杨一清曾用计排挤比自己资历深厚的大学士谢迁。翁同龢显然是用这个“谢迁之去”的典故来暗示自己是在军机处遭人排挤才离职的,他当然不承认自己不胜枢臣之任,而是从派系斗争方面寻求原因的。^③翁离京后,其侄孙翰林院编修翁斌孙向叶昌炽透露,翁之开缺,“木讷令兄有力焉”。^④所谓“木讷令兄”即指刚毅。可见,翁同龢坚信是刚毅从中作祟。翁氏门人几乎都持此论。沈曾植《寄商虞山相国师》诗云“松高独受寒风厄,凤老甘为众鸟侵。”又云“睚眦一夫成世变,是非千载在公心。”^⑤所谓“睚眦一夫”也指刚毅。孙雄、唐文治甚至认为在翁氏生日这天宣布将其开缺,就是刚毅这位阴险小人的恶毒计策。^⑥

翁氏的政敌也对其开缺极为关注。六月初八日(7月26日),鹿传霖在家书中称“翁六吃洋债成头并为王幼霞(王鹏运)所劾,又以谏上带宝星、用文廷式触怒,遂被斥去。荣相本议入枢,裕(裕禄)代夔(王文韶,字夔石)督直,乃有人以其与礼邸姻亲,同枢不便为辞挤之使出,裕竟入枢,纯是一班唯诺敷衍之人。国事真不可闻。”^⑦鹿氏不仅敌视翁同龢,对军机处的新调整也不满意,他对翁氏的评价毫不涉及政见新旧,纯粹从朝局变化和人脉关系发论,也算是一家之见。

从上述对翁同龢开缺事件的反应看,不管是在京洋人,还是京官士大夫,甚至翁同龢本人,大多从朝中人事纠葛和权力斗争的因素去解释翁氏遭黜的原因;即使提及政见新旧,也多认为翁氏守旧;论者对翁既有同情,也有批评,也有追究甲午战后交涉失误的说法。但是,有一点是无可怀疑的,当时没有任何人明确提及翁氏“荐康”之事,即使康、梁本人也是如此。还有一个被人们忽视的细节:康有为政变后在香港首次宣扬翁氏“荐康”说时,唯恐世人不信,特别强调“有谓翁(同龢)为守旧党,实非也。”^⑧这句解释,在不经意中恰好说明了一种事实,在政变前很多人都认为翁氏是“守旧”的。

三、前辈学者的质疑与申说

本来身处政治漩涡中的翁同龢处处谨慎,甚至不惜顶撞光绪帝,抵制年轻皇帝的激进做法,其“守旧”倾向流露无遗,这一点其同僚刚毅最为清楚。不料,政变发生两个月后,翁氏却背负了“力陈变法、密保康有为”的罪名,遭到革职的重黜。这是刚毅等人在谈“新”变色的政

① 唐文治《茹经堂文集》,《戊戌变法》丛刊第4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第252页。
② 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6册,中华书局,1998年,第3137页。
③ 参见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第171-172页。
④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钞》,《戊戌变法》丛刊第1册,第529页。以“刚毅木讷”之语,暗指刚毅。
⑤ 钱仲联校注《沈曾植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202页。
⑥ 唐文治《茹经堂文集》,《戊戌变法》丛刊第4册,第252页。
⑦ 鹿传霖家书,戊戌六月,《鹿传霖任川督时函札》,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藏,档号甲170。
⑧ 《逋客问答》,《申报》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初二日。

治氛围中,秉承慈禧旨意,对翁刻意倾陷的结果。^①当康有为“围园弑后”的密谋暴露后,六君子惨遭杀害,新旧之争终于超越了政见异同,外化为残酷的权力斗争,并染上了血腥色彩。被打入“康党”的翁同龢政治生命彻底结束。显然,翁氏是先成“康党”,才成“新党”的。他的“新”是被强加的,与其戊戌年春实际的政治态度已是风马牛不相及了。

正因为如此,翁同龢革职后,刘坤一、张謇等人对于清廷将翁打入康案皆不以为然,以为罪在莫须有间,对翁的遭遇极为同情。^②光绪三十年,翁同龢逝世后,有论者在报章撰文对翁氏“荐康”公案提出异议:“常熟于戊戌四月之间开缺回籍也,世以为太后恶其保康有为之故。其后十月之革职遭谴也,谕旨亦明斥其曾保康有为,此事几成为信史矣。虽然,常熟重门籍,而康非其主乡、会试所取之人;常熟重翰林,而康乃一甫通籍之主事。以其习向言之,恐未必契康若是。且常熟以二十七日开缺,而康适以其明日蒙召见,此亦不可解者也。”^③同样,其他熟知清末政坛内情者也对翁氏支持变法和“荐康”的说法提出质疑,只不过他们的呼声十分微弱,没有引起太多的共鸣。

清季一些世家子弟,由于特殊的阅历和见闻,对晚清政局的看法多有独到之见,他们对戊戌年翁氏开缺问题的分析也是如此。近人刘体智(清季四川总督刘秉璋之子)称“常熟当国既久,以古大臣自励,颇不悦于维新异说之骤起,力争于上前。至称康有为至才胜臣十倍,正负气之语。措词切直,更失帝眷。慈圣重临朝,憾者摭拾前说,以辞害意,遂获谴。然慈圣隐痛,在于甲午战祸之首。一日两诏,与吴大澂异案同罚,尤见微旨。”^④刘氏显然对这桩公案有过深入的关注。在他看来,翁氏失去光绪眷顾,实因抵制变法而起;翁并不悦于“维新异说”;翁氏十月革职则出于慈禧之意,微旨在于追究甲午主战之责,所谓“其才胜臣百倍”的荐康之语,不过是憾者(刚毅)以辞害意的名目。刘体智把翁氏开缺和革职的原因分别考量,非常符合历史的实际情况。

民国学者杨佛士是清末常熟学者杨泗孙的曾孙,戊戌时期后党人物杨崇伊的侄孙,翁同龢乃其乡前辈。因两家为世交,佛士为探讨翁氏开缺内情,曾遍访同乡前辈,广集口碑以释疑窦。他在文章中写道:

至于他(翁)得罪的原因,有些人与八月政变并作一事,就十月间的谕旨看,好像是对的,但实际并不尽然。……我根据在京有政治见解的老辈的说法,恐怕是当时几个不同方向的力量凑合而成的局面。当时同在军机的刚毅原是后党中坚,久已要甘心于老夫子;而同为帝党的张荫桓,把康有为窝在家里,天天商量怎样示威,怎样变法,他们觉得老夫子处事太过持重,太过考虑,有他在皇帝跟前,不但张荫桓做不着帝党的魁首,而且着实有些绊腿。又知道后党方面对于排挤翁师傅是百分之百的同意,更可以暂时利用一下。而光绪呢,那时正着了张、康诸人的迷,很想一下子把局面改变过来,也觉得老夫子的迂缓态度,不合脾胃,那年四月上旬,为了索取康有为著作,君臣间曾经抢白……,所以戊戌四月间的事,是几个不同的力量凑合起来的,而以帝

① 参见马忠文《翁同龢、康有为关系考论》,收入常熟市人民政府、中国史学会编《戊戌变法与翁同龢》,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224-253页;《张荫桓、翁同龢与戊戌年康有为进用之关系》,《近代史研究》1012年第1期。

② 参见刘坤一:《复欧阳润生》,《刘坤一书牒》,《戊戌变法》丛刊第2册,第633页;《张謇年谱》,《戊戌变法》丛刊第4册,第199页。

③ 《论客述翁故相遗事》,《中外日报》,光绪三十年六月初一日;杨琥编《夏曾佑集》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202-203页。

④ 刘体智《异辞录》,刘笃龄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66页。

党方面的成分为多。至于十月间编管(交地方官严加管束称为编管)的谕旨“今春力陈变法 滥保匪人”等语调,那完全是后党架砌的话了……^①

杨佛士的基本观点是翁氏戊戌罢官与变政及政变均无实际关系,翁氏开缺是多方面原因促成的,主要与失眷于光绪帝有关。史学家吴相湘对此极表赞同。他说“我们应该承认这一朱谕内容的真实,翁的罢免并不是莫须有之罪。……在这许多的原因凑合下,尤其是翁再三力谏帝不可与外人接近及不宜专讲西学的事实,是使力图振作的光绪帝决心罢翁的重要原因。但近二十年来刊行的近代史书中,对于翁与康有为的关系不加仔细探究,辄以翁的被黜是新旧党争遭受旧党倾陷的结果,谁知事实恰巧相反:翁不是旧党,也不是新党,实际上是孤立的,所恃的只是皇帝师傅关系,而又不能满足年少力图振作的皇帝心理与要求,当然只有去位的一途了。”^②作者的观点很明确,翁氏开缺与新旧之争无关,只是不能满足皇帝一意趋新的心理而被罢黜。

不久前辞世的何炳棣先生在上世纪40年代就提出,考察翁氏戊戌年的政治作为,应考虑其实际处境。他认为,戊戌年春举荐康有为者乃张荫桓,而非翁同龢。“当此之时,同龢所处地位最难,南北之争,英俄之争,满汉之争,以至帝后之争,同龢无不身当其冲。同龢非不知中国需改革之切,而不敢同尽废旧章之改革;非不知中国需才之殷,而不敢用驰突不羁之才;非不愿有所建树,而不敢以首领利禄为孤注。故于变法之论,未尝执义力主,亦未尝昌言反对。”^③翁氏的处境决定了他的态度。近人曾毓雋也有“翁同龢持两端,受新旧两派排挤”的判断,^④看来翁氏的处境确实比较艰难。

翁氏因所处地位特殊,可能没有很深地介入新旧党争之中,但其面对变法谨慎保守的状态则无可怀疑。当时的新旧标准也是多层面的,龚纳乐、赫德等外籍人士的评判不用说,以康、梁的激进主张衡量,翁氏自然属于落伍;就连光绪帝都对翁的持重表示不满,可见说翁“旧”绝不是没有根据的臆说。

醉心于西化改革的年轻皇帝受到张荫桓的影响,在戊戌年春越来越反感谨慎持重的翁同龢。在三月间德国亲王亨利访华觐见仪节安排上,光绪帝坚持按张氏拟定的西式仪节来接待,其中包括“握手”、“赐座”、“回拜”诸项内容,但遭到包括翁在内的王大臣的一致反对,直到慈禧亲自出面干预,光绪才不得不略有让步。^⑤翁氏开缺的第二天,皇帝在召见张元济时谈到,“外患凭陵,宜筹保御,廷臣唯诺,不达时务”,仅“讲求西学人太少”一句,便言之再三。这些话颇能反映皇帝当时的心态。按他的标准,廷臣中翁同龢自然难属“讲求西学人”。况且,据张元济所说,“自常熟去国后,举行新政,明诏迭颁,毫无阻滞,其融泄之情更有进于畴昔者矣。”^⑥好像光绪帝在罢免翁氏后,阻力大减,行动自如了许多。大约同时,光绪又赏李鸿章、张荫桓“宝星”。李、张当然是公认的讲西学的人,奖惩之间实际上已反映出年轻皇帝对廷臣“讲求西学”与“不讲求西学”的区分。从这些情况分析,光绪帝并不认为翁是能够赞助改革的人物,所以有学者推论翁氏开缺出于皇帝的决断,并非毫无理由。

① 杨佛士《略述翁松禅先生》(下),《畅流》第7卷第3期,1953年8月。

② 吴相湘《翁同龢戊戌罢官原因》,《晚清宫廷与人物》第1集,第89-90页。

③ 何炳棣《张荫桓事迹》,《清华学报》第13卷第1期(1943年3月),第185-210。

④ 曾毓雋《宦海沉浮录》,《近代史资料》总68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21页。按,戊戌变法期间作者正在北京。

⑤ 对此,翁同龢戊戌年三月、闰三月的日记中有详细反映,兹不详引。

⑥ 《致沈曾植》,戊戌年六月十八日,《张元济书札》(增订本)中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675页。

同样,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学者陈贽曾专门撰写《戊戌政变时反变法人物之政治思想》一文,将翁同龢列为典型的守旧人物加以分析。他认为翁氏开缺出于光绪之意;至十月革职则旨意出于慈禧,“或以翁本帝党,欲加之罪,正可藉此为辞,不必果以其拥护变法之故也。”^①可见,党争才是翁氏受黜的主因。直到上世纪50年代初,胡滨仍撰文认为翁氏是守旧的,并引发过一次小小的争鸣。^②看来,学界对戊戌年翁氏的守旧倾向还是有所关注的,只是翁氏“荐康”说的声势过于强大,这些微弱的声音一直都被遮盖着。

四、结 语

正如一些前辈所指出的那样,后世对翁氏开缺原因的基本判断,与戊戌十月翁氏革职上谕的影响直接相关,这是造成人们认识误区的关键所在。开缺与革职虽不无关联,到底还是两起不同的政治事件。翁氏于定国是诏颁布后数日开缺,正值变法开始之时;而革职则在政变两月后,正当刚毅等反攻倒算之际。前后相隔半年,环境氛围迥然不同。然而,人们受到清廷上谕的影响,往往以翁氏革职的原因来逆推其开缺的内幕,认为革职是对翁氏以前支持变法的进一步追究。这样倒放电影式的逻辑推理遮蔽了真相,左右了人们对翁氏开缺问题的思路,致使我们的历史认识出现了不可避免的偏差。

当然,揭示戊戌年春翁氏“旧”的一面,只是出于恢复其本来面目的考量本身,这里并没有对其做出否定性评判的意味。况且,抽象而空泛的历史评价是毫无意义的。事实上,戊戌时代的变法是多层面的,绝非只有康、梁变法一途。史学家陈寅恪曾言“当时之言变法者,盖有不同之二源,未可混一论之也。”“至南海康先生治今文公羊之学,附会孔子改制以言变法。其与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者,本自不同。”^③以后来者的眼光看,近代中国发展的道路正是“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者”,直至清末预备立宪仍是这个渐进展开的改革方向。虽未明言,大约在陈寅恪看来,康有为“托古改制”的变法活动,得到的支持甚少,并非戊戌变法的主流;而乃祖“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者”即“中体西用”者倒是切实可行的路子。萧公权也认为,翁同龢的思想大体属于“中体西用”的范畴,属于稳健的改革者。^④从反对康氏激进变法的角度说,翁同龢与陈宝箴、孙家鼐的政治态度完全一致。所以,谨慎与稳重也会表现为“守旧”这样的“旧”比起那些漫无章法、急功近利的“图新”并非毫无意义可言。戊戌变法的失败除了从保守势力的阻挠方面寻找原因,改革者的急迫、忙乱、不切实际更是导致变法失败的主因,这一点已是学界的共识。

(责任编辑 朱剑)

① 陈贽《戊戌政变时反变法人物之政治思想》,《燕京学报》第25期,1939年6月。
 ② 1954年1月25日《光明日报》发表了胡滨《论翁同龢与戊戌变法的关系》一文,提出“从种种事情上看,翁同龢应是顽固守旧的人物,……足以证明翁同龢并未保举康有为。……康、梁是维新人士,把翁看成积极分子,这不能不是历史上的错误。”1955年7月21日,张子扬在《光明日报》发表《关于翁同龢与康梁关系的一件史料》,认为胡滨的结论与事实不符,并举出有一封翁氏自己承认举荐康梁的密信为证。很多年后,经过考订,学界开始指出这份翁氏手札是伪造的(参见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第184-185页;孔祥吉《关于翁同龢一封密函的订正》,《学术研究》2000年第3期;朱育礼《翁康关系史料辨伪》,收入常熟市人民政府、中国史学会编《戊戌变法与翁同龢》,第298-303页)。
 ③ 陈寅恪《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寒柳堂集》,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167页。
 ④ 参见萧公权《翁同龢与戊戌变法》,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3年,第83页。